

會館、華商與華校的結合:以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為例

利亮時 楊忠龍

一、前言

19 世紀中葉，大量中國移民以勞工身份，湧入新加坡與馬來亞¹(簡稱新馬)兩地謀生。惡劣的求生環境讓這些刻苦奮鬥的移民意識到相互照應的重要。在他們之中，有因積極從商而致富的商人。這些商人為了團結移民社會，於是組織了會館和商業團體，他們也自然地成為了這些組織的領導人。由於傳統思想的影響及他們在奮鬥過程中體認了教育的重要性，再加上殖民政府對華文教育的不干預政策，發展教育事業便成為華人團體，尤其是會館的一項重要任務。二次大戰前，由商人主導的會館開始辦學校，例如當時的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簡稱茶陽會館)創辦了啓發學校;新加坡福建會亦創辦了道南、愛同和崇福女校三間學校等等。²在這種環境下，華商除了是商人的身份外，也是會館的領袖以及華文教育的創辦者，「多重身份」也讓華商、會館和華文教育(簡稱華教)形成了緊密的關係。本文的茶陽會館領袖，茶陽會館和啓發學校正是這種關係的例子之一。本文將勾勒華商與會館在華教所扮演的角色；啓發學校的創立經過；二戰之後英殖民政府和後來人民行動黨政府處理華文教育的政策與態度；以及華商、會館與華教的「三結合」機制，如何啟動應變之策。這些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二、華商與華文教育

會館、華商、華教是新加坡³華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當中，商人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的影響力從商場延伸到會館、華校，並把這三者緊密聯合在一起，形成新加坡華人社會特有的「三結合」機制。商人就是在這種

¹ 「馬來亞」一詞，在二次大戰前是指當時的英屬馬來亞半島，包括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馬六甲與檳城）、馬來聯邦（雪蘭莪、霹靂、森美蘭及彭亨）和馬來屬邦（吉打、玻璃市、丁加奴、吉蘭丹與柔佛）三區。二次大戰后，英殖民政府就政治因素，將新加坡從馬來亞分割出來，變成了兩個政治單位。見 B. Simandjuntak, *Federalisme Tanah Melayu 1945-1963* (Petaling Jaya: Penerbit Fajar Bakti, 1985), p.60.

²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特刊編委編《茶陽(大埔)會館 144 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2001), 頁 56; 吳華《新加坡華族會館志》(新加坡:南洋學會, 1975), 頁 4-5。

³ 華商、會館與華校的結合，並非新加坡華人社會所獨有，在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地都是以這個模式在辦校。21 世紀的今天，這個辦學模式仍存在於馬來西亞。由於本文是以新加坡為探討重點，所以並沒有去討論其他的區域。

特有的機制下，成爲華人社會的領導者。當外在的威脅影響到這個機制中的任何一環時，華商就有挺身維護的責任。1950 年代初期由於共產主義的威脅，以及殖民政府的壓縮政策，新加坡華文教育面對存亡絕繼的危機。這危難的關頭，也是考驗華人社會機制的一個契機。

殖民政府對於新加坡華文教育是採取「自生自滅」的政策，因此華文教育的存活，必須依賴族群的支持。這也形成了華文教育與華人社會機制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早期的華人社會，有許多是南來的中國商人。據東南亞研究著名學者王賡武的研究顯示，這些移民被歸類爲「華商型移民」是 18 世紀中國移民的主流。⁴19 世紀 1840 年代以後，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以及接連不斷的動亂，嚴重破壞中國的經濟，人民生活陷入困境。當時西方勢力在東南亞殖民地發展，吸引大量中國老百姓向海外遷徙和謀生。在新加坡地區，殖民政府鼓勵商業活動，營造一個良好的商業環境，爲這些南來的中國移民，尤其是商人，提供了許多營商的機會。⁵部分華商遂逐漸形成一個富人階層，也有部分成爲了華人社會的領導層。⁶殖民政府在推動「重商政策」的同時，亦鼓勵華商進入華人社會的領導層，以此來達到控制華人社會的目的。華商事業有成之後，也希望在社會佔有一席之地，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華商逐步登上華人社會的領導階層。

在成爲社群領導的同時，這些華商強烈意識到延續家業和社會地位的重要性。他們開始成立行會、宗親團體、會館，把自己和社群組成一個「生命共同體」，爭取自身和族群的利益。⁷會館等組織成了聯絡同鄉感情和讓商人推進黨務的場所。⁸會館的運作需要的是經費，因此商人便能憑藉雄厚的財力，順理成章登上會館的領導階層，鞏固他們在華人社會的地位。

會館既然由華商領導，他們就有責任出錢出力辦教育。這樣除了有助於他們獲得族群的認同與讚揚，提高和維持他們在社群的聲望和影響力外，同時也履行了他們作爲社會領袖的義務。由於當時華文學校的發展一直沒有獲得殖民政府的支持，華文學校的發展經費主要都是依靠華商、會館和華人社會的熱心人士捐款才得以維持。茶陽會館於 1906 年由劉春榮領導創辦啓發學校；⁹應

⁴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6—7。

⁵ 萊佛士 (Stamford Raffles) 在新加坡開埠後，開始實行重商主義政策，即給予商人特殊優待，處處保護商人的利益，並且公開宣稱商人階級是新加坡社會的中堅分子。見林孝勝〈開埠初期的新華社會〉，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頁 8。

⁶ 顏清滄《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頁 150—151。

⁷ 例如四邑（新寧、新會、恩平和開平）人士設立的北城行和曹家館，南海和順德邑人成立南順會館。林孝勝〈十九世紀新華社會的幫權政治〉，見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頁 44—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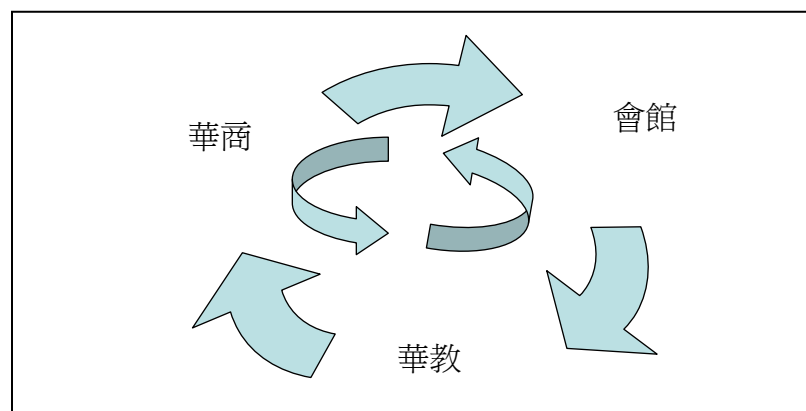
⁸ 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臺北：學生書局，1966），頁 10。

⁹ 茶陽會館編《新加坡茶陽會館百年紀念刊》（新加坡：茶陽會館，1958），頁 10。

和會館也在黃雲輝等領導下，於 1904 年創辦應新學校。¹⁰這些 20 世紀初期學校的成立，正是華商、會館與華教結合的成果。

換言之，華商、華團和華教，已形成爲一個「三結合」的緊密機制。在這個機制底下，華商擁有商人、會館領袖和學校創辦人的「多重身份」，這正是確立華商在華人社會的領導地位。（參看圖一）從 20 世紀初至中期，許多的商人，如客家籍的劉春榮、黃雲輝，福建籍的陳六使，潮州籍連瀛洲等都是在這個機制中，鞏固自己在族群中的領導地位。

圖一：華人社會機制中「三結合」示意圖



圖一顯示了華商在整個「三結合」裡頭的重要性和多重性，本身是經營生意的商人、另一方面也是會館的領導人，以及華文學校的主要贊助人。這些關係都鞏固了商人的地位，而在族群在教育問題出現危機之時，商人就成爲了族群教育與文化的捍衛者或代言人。啓發學校的成立正是「三結合」機制的產物之一。

三、啓發學校的創立

清朝末年，中國的維新派與革命黨，爲了尋求海外的資助，紛紛出洋至東南亞或美國。這些人士爲東南亞帶來了新思想與新的教育制度，新加坡受到這股思潮的影響，尤其在思想與教育方面。新觀念與新式教育的傳入，使得私塾教育走入歷史，而西方式的教育則成爲之後辦教育的參考重點。當時的商人都意識到新式的教育的重要性，而紛紛出資興辦，啓發學校亦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華校之一。啓發學校創辦於 1906 年，當時的客籍商人劉春榮爲了讓同鄉子弟能夠接受新式的教育，便發起籌款租下陸佑街(Loke Yew Road)的店屋，創辦了啓發學校，開辦之初學生有六十多人。之後茶陽會館增建，啓發學校也搬入會館，而學生增至一百多人。1937 年茶陽會館的領導人張夢生，聯合其他客

¹⁰ 新加坡應和會館特刊編委編《應和會館 181 周年會慶暨大廈重建落成紀念特刊》(新加坡:應和會館, 2003), 頁 94。

籍商人林師萬、陳翰生等為啓發學校購置新校址，該處有 10 間課室，學生因此增至五百多人。¹¹二戰後許多在戰時失學的青年，求學心切紛紛報讀華校，使得當時華校一片興旺。爲了應付日益增多的學生，茶陽會館會長張夢生領導董事部，進行擴建學校的工作。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被逼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在教育政策上，推動了以英文爲主，其他語文爲輔的政策。上述教育政策的推行，壓縮了其他語文學校的生存空間，當時的啓發學校也面臨發展的危機。1985 年，啓發學校董事部與教育部協商，決定該年停辦原有的啓發學校，由教育部在西海岸路 50 號另建新校舍，茶陽會館捐獻新幣 10 萬元(台幣約 2 百萬)協助學校的發展，該新學校取名爲啓發學校。新的啓發學校亦邀請茶陽會館選派董事出任學校諮詢委員會之成員。啓發學校的興辦得力於商人主持的會館，而其走入歷史則與新加坡的教育政策有莫大的關係。

四、二次戰後的新加坡華文教育

華商、會館和華教的結合，使華商成爲這個機制中的重要樞紐。當任何一環遭遇危機時，華商都必須想方設法來化解。20 世紀之初新式華文教育的萌芽，商人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而當 1950 年代的華文教育正面對存亡的困境，華商自然要挺身而出來解救。

新加坡華文教育始於 19 世紀中期，最初是沿用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教學內容以《孝經》、《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爲主。正如前節所述，19 世紀末，維新派人士和革命黨員南下新馬。兩派人馬除了宣揚各自思想外，更極力倡議設立新式學校。在這些人的影響下，華文教育開始以西方概念辦新式學校，取代私塾教育。新加坡華文教育的革新，仍然是以中國作爲因襲的對象。就學制而言，小學六年、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是中國新學制的翻版。在課程方面，科目都是按照中國的模式，教科書也是採用中國的中華、商務等書局編印的課本；師資方面則以中國南來的教師爲主。¹²這種移植式的教育，使學生的意識形態深受中國的影響。¹³當時學生所關心的是中國事務，熟悉的是中國的歷史地理。殖民政府開始察覺華文教育發展，很可能會對他們的政權產生負面的影響，於是一改之前放任華文教育發展的政策，而在 1920 年頒佈《學校註冊法令》對當地的華文學校進行管制。該法令規定只要一所學校的學生人數在十名或以上，就必須向政府申請註冊。某學校若被發現有妨礙地方安寧

¹¹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特刊編委編《茶陽(大埔)會館 140 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1997), 頁 129。

¹² 王賡武〈海外華人：未來中的過去〉，見劉宏、黃堅立編《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美國：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2002)，頁 39—40；崔貴強《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 1990)，頁 19—20。

¹³ 當時華校的發展，一方面是由於華校本身的健全制度，另一方面則是獲得中國政府的指導。T.R. Doraisamy, *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1969), p.87.

時，政府有權取消該學校的註冊。¹⁴華文教育由放任發展，進入受政府監督的階段。

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局勢的變化深深影響了上述華文教育的發展。當時的世局出現兩極化的現象。在歐洲，美國與西歐諸國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1949）。蘇聯則將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東德、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納入共產勢力範圍，組成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1955）。於是歐洲二分，各自呈現對立的內政建制、經濟制度和對外政策，導致世界處於冷戰的局面。在亞洲區，兩大勢力的競爭也非常激烈。二次大戰剛結束，國民黨與共產黨便以武力爭奪中國大陸的統治權。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擊敗國民黨宣佈共和國政府成立，共產主義即在亞洲大陸佔有龐大的根據地。為了防止共產勢力進一步擴張，美國遂聯合其他歐、亞、美各洲的盟國，對共產勢力，包括中共政權採取圍堵政策。

國際政治勢力的兩極化影響了東南亞政局的穩定。二次大戰後，大部分東南亞地區仍屬殖民地。戰爭的失利，使各地殖民政府的控制權大受動搖。中共成功擊敗國民党政權，鼓舞了各殖民地人民藉武力爭取獨立的行動，也讓殖民政府面對嚴峻的考驗。新加坡社會的左傾意識形態，二戰前早已在華人社會流傳，¹⁵馬來亞共產黨（Malayan Communist Party）也於1930年4月成立。¹⁶抗日時期，新馬抗日分子多是華人，他們組成抗日組織「馬來亞人民抗日軍」（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其中便有許多是馬共成員。¹⁷二戰結束後，因抗日而壯大的馬共，¹⁸不被殖民政府接納為合法組織。於是他們發動武裝政變，冀望奪取殖民地的政權，以建立馬共政府。殖民政府與共產勢力便陷入爭戰，以致發生了1948年的「緊急狀態」（Darurat）。¹⁹

¹⁴ *Ibid.*, p.86–87.

¹⁵ 自1924年，中國共產黨便已開始派人到馬來亞和一些遠東地區宣傳馬克思主義。Gwee Hock Aun, *The Emergency in Malaya*, (Penang: Sinaran Brothers Limited, 1966), p.1; 1926年，新加坡「共產青年聯盟」（Communist Youth League）成立，他們對當時的華校和夜校進行思想宣傳，造成很大的影響力。Gene Z. Hanrahan,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4), p.8.

¹⁶ Khoo Kay Kim, “Gerakan Komunis di Tanah Melayu Sehingga Tertubuhnya PKM”, in Khoo Kay Kim dan Adnan HJ. Nawang ed. *Darurat 1948-1960* (Kuala Lumpur: Muzium Angkatan Tentera, 1984), p.25.

¹⁷ 新馬僑友會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香港：香港見證出版公司，1992），頁14–17。

¹⁸ 二戰前的馬共沒有遊擊隊組織，但日侵時戰敗的英殖民政府，希望民眾支援他們抗日，因此鼓勵馬共組織遊擊隊來抗日。日軍投降後，馬共在各地搜獲許多遺棄的兵器、彈藥和糧食，這都增強他們的武裝勢力。見韓元山、李永樂《戰時馬共組織概況》，《馬共秘聞》（新加坡：勝利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8），頁22–23。

¹⁹ James P. Ongkili, “Darurat dan British, 1948-1960: Suatu Pernilaian”, in Khoo Kay Kim dan Adnan HJ. Nawang ed. *Darurat 1948-1960* (Kuala Lumpur: Muzium Angkatan Tentera, 1984), pp.5-9.

共產勢力的威脅使得殖民政府對中共政權懷有極大的顧忌和敵意。1949年以後，殖民政府對華人社會實施嚴厲的移民政策，中斷了新加坡華人社會與中國人民的關係。²⁰同時，政府也把新加坡從馬來亞分割出去，成為另一個政治單位。表面上，殖民政府是擔憂，新加坡加入馬來亞會增加華族人口的比例，對馬來人的政治利益將造成損害。²¹事實上，殖民政府更擔憂共產勢力利用華人奪取政權。在這過程中，殖民政府亦擔心華文教育會受共產主義滲透，淪為宣傳其意識形態的工具，因而實施加強管制的政策。

1949年後共產主義擴張威脅，使殖民政府的華文教育政策有所改變。在1946年由當時提學司尼爾遜（J.B. Neilson）擬訂《十年教育計劃》，經立法議會修正後於1947年通過。該計劃原則上要達致下列三個目標：（一）教育應該針對擴充自治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培養當地人民效忠與負責任的思想。（二）各民族男女兒童皆可獲得同等的教育機會。（三）除了提供小學免費教育外，中學教育、技職教育與高等教育將根據國家的需要加以發展。²²尼爾遜在原稿中，為了強調母語的重要性，提議英文媒介的初級教育，將只限於以英語為母語，或有英語家庭背景的兒童就讀。²³然而，這項建議經過一個以林漢河（Sir Han Hoe Lim）為主席的四人委員會（其他三位成員：Dr. Abdul Samat, Mr. G.A. Potts, Mr. V. Pakirisamy）討論後，將原有限制放寬，即凡與英校有關係的人士都可以進入英校就讀。²⁴整體而言，該法令雖然將英校的收生限制放寬，但是仍肯定母語教育的存在價值，並給予華文教育津貼。這種較有利華文教育的政策在1950年就出現轉變，當時殖民政府推出《五年教育補充計劃》，該項計劃著重發展英文教育，提供各種優惠政策與華文學校進行競爭。²⁵殖民政府的意圖十分明顯，正如當時馬來亞大學教授費德烈麥臣（Frederic Mason）對新加坡教育政策所作的評論：

……戰後的新加坡教育政策，積極擴充與發展英文教育，並以較其他源流學校更低廉的學費來吸引家長把其子女送入英文學校就讀。此舉是間接的將一些政府難以控制與規模較小的華文學校學生，吸收到政府辦的學校去。……²⁶

²⁰ 1951年9月30日後，新加坡與中國斷交，任何人不能再由中國申請回新馬。見《南洋商報》（新加坡），1951年7月1日。

²¹ K.G. Tregonn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Donald Moore, 1966), pp.35-36; B.Simandjuntak, *Federalisme Tanah Melayu 1945-1963* (Petaling Jaya: Penerbit Fajar Bakti, 1985), p.60.

²²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Ten Years – Programme*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48), p.5.

²³ *Ibid.*, p.6.

²⁴ *Ibid.*, pp.27-29.

²⁵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nual Report for 1950*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51), pp.57-59.

²⁶ Frederic Mason, *The Schools of Malaya* (Singapore: Donald Moore, 1957), p.25.

《五年教育補充計劃》推出後，殖民政府在同年頒佈《學校註冊法令》，賦予註冊官掌控學校存亡的權力。²⁷此舉進一步威脅華文教育的發展。在殖民政府眼中，讓華文教育繼續發展會威脅他們的既定政策和利益。

1950 年代華文教育在內外因素衝擊下陷入發展困境。外部政策的調整，來自於殖民政府懼怕共產勢力利用新加坡與中國兩地人民的往來進行滲透，而採取禁止兩地人民往來的政策。在內部，殖民政府則擔心華文教育會被共產勢力利用，而推行重英抑華的教育政策，以防止華文教育成為共產主義的溫床。壓縮華文教育的政策，再加上禁止華人來往新中兩地，不但使華文教育發展受挫，也斷絕師資來源和高中畢業生的升學管道，²⁸這些對華文教育的不利因素和障礙，便成為華人社會關心的焦點。

二戰後世局的轉變，使新加坡華人社會面對認同取向的抉擇，這種抉擇只限於國家層面，在文化上他們仍然是認同中華文化。自 1949 年後，新加坡華人認同所在地是第一故鄉，但仍保留自身的文化認同。²⁹當殖民政府推行以英文為主、貶抑華文的教育政策時，華人社會普遍認為這是對自身民族文化的威脅。因此，華文教育的鬥爭，實際上源于華人社會對保留自身文化的危機感，教育問題演變成了文化認同的問題。華裔在新加坡社會的獨特地位，讓他們成為民族文化的捍衛者。在這種有別於中國的社會環境下，使華裔、會館和華教形成一個特有的「三結合」機制來保護本身族群的利益。

1956 年南洋大學的創立，正是華人社會「三結合」機制的總動員，最後促使了這一所，也是東南亞地區至今唯一以中文作為教學媒介語大學的設立。中文大學的設立，仍無法弱化或抗衡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的精神，基本上由後來的人民行動黨政府所繼承，再加上 1965 年獨立建國後面對的外在威脅，讓教育政策傾向以英文，作為統一各源流教育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華人社會「三結合」機制與教育政策的角力戰。兩方的角力戰直至 1980 年代後期才宣佈結束。

五、「三結合」機制的式微

人民行動黨，自 1959 年上台後，歷經了 1963 年的馬來西亞合併，以及 1965 年的建國獨立。該黨的教育政策，一直以務實為其目標。為了將新加坡打造成東南亞的樞紐，以及避免讓周邊的國家視為「第三中國」，而致力減少新加坡的「華」的成份，殖民政府之前的教育政策(英文為主要媒介語)符合了新

²⁷ *The Laws of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Volume 5*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55), pp.630-646.

²⁸ 一般高中畢業生的出路不外兩條，即回中國升學和就地謀事。殖民政府禁止兩地人民的往來，截斷學生到中國升學之路。放洋留學，只是少數家庭經濟較為富裕的畢業生才有如此的機會。見《中華總商會第十一次董事會議議記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53）。

²⁹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238。

加坡未來發展的利益。人民行動黨的教育政策雖然繼承了殖民政府，但是在現實的考量是略作了改變：以英文為主，各族群語文為輔。人民行動黨政府按照上述的方式著手改革全國教育制度，以制訂全國統一的教育制度，建立一個適應新環境的教育制度，消除各語文族群之間長久以來隔閡、甚至是互相猜疑的舊風氣，以塑造一個共同效忠新加坡的多元族群社會。從殖民政府至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教育政策，造就這個社會需要的是英文學校或英文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而非其他語文教育所培育的人才。在這種大趨勢底下，華文教育面臨生存的危機。從 1950 年至 1953 年間，華校學生人數只從 72,951 人微增至 79,272 人。反觀同時期的英校，學生人數卻大幅度增長，從 49,521 人增至 1953 年的 71,003 人。³⁰ 1960 年代華校學生人數，更呈現負成長的窘境。「三結合」機制雖然不斷資助華文學校，甚至在 1956 年成功創辦南洋大學，然而這些努力都無法改變一個事實：學生畢業後沒有出路。在文化傳承和學子未來出路的兩項選擇下，許多家長選擇了後者，這導致華校學生的銳減。茶陽會館在 1985 年停辦啓發學校，正是因為學校沒有生源，在「有校無生」的情況，停辦是唯一的選擇。

1980 年代後期，華文學校正式走入歷史，這也象徵著「三結合」機制的結束。教育的興辦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政府正努力塑造一個不分族群，不分語言的「新加坡人社會」，商人的族群代表角色自然沒有必要再強調。「三結合」機制的結束，商人與會館開始從昔日的族群維護者，轉變為族群文化的發揚者。新加坡華校已經消失，剩下的只有華語的教育，會館與商人在這個僅有的陣地，扮演鼓勵與支持的角色，讓中華文化能夠繼續的傳承和發揚。因此會館頒發華文科成績優良的獎金，舉辦文化活動等等。啓發學校已經隨著其他華校關閉，而茶陽會館的董事仍願意參與新學校的諮詢委員會，除了影響學校把校名取為啓發之外，亦希望透過會館的參與，把學校的「中華」色彩提高。「三結合」機制可能已經完成其階段性的歷史任務，但是文化的發揚與推廣，卻成為商人與會館的下一個任務。

六、結語

華人社會獨特的「三結合」機制，提供華裔成為社會的領導者。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也使華裔和華文教育形成一個緊密的關係。為維護他們在社會的地位，必須在華文教育上有所貢獻。1950 年代的華文教育產生很大變化。二次大戰後，國際局勢的轉變影響了新加坡社會情況。亞洲共產勢力的擴張，使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政治傾向受到殖民政府的質疑。政府的許多既定政策，旨在加強管制華人社會的發展，避免他們走向左傾。華文教育首當其衝，成為嚴格管制的目標。對外方面，政府禁止新加坡人民與中國人民往來，導致華文師資

³⁰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45-1958)*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59).

來源和華校生升學管道中斷。在內則是採取重英抑華的教育政策，在面對夾帶龐大資源的英文學校競爭時，華文學校陷入掙扎求存的困境。然而，二戰期間大量的失學青年成爲了華校的主要生源，殖民政府的政策暫時無法對華校產生立即的影響。從茶陽會館創辦的啓發學校，正可以窺探華僑、會館與華校的「三結合」模式。從啓發學校的創辦至關閉，正是華文學校或華文教育歷史的縮影。啓發學校的艱苦經營，直至關閉，也正是人民行動黨政府務實教育政策下的結果。新加坡華文教育的消失，剩下只有「華語教育」，這也代表著「三結合」的終結或退場。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商人與會館也從此瓦解，他們仍在文化中扮演推手的角色，讓華人文化能夠在這新加坡這片土地上繼續傳承下去。